

# 我自铸铜铍及其相关问题

赵晓军(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副研究员)

蔡运章(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研究员)

洛阳市宜阳县文化馆收藏有一件自铭为“铍”的剑形兵器。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铜铍的起源、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

## 一 铜铍的形制、铭文和年代

这件铜铍由身、格和茎(柄)组成。身扁平细长,前端稍窄,中脊隆起,断面呈菱形,后端近格处有一横向浅槽。格已锈蚀松动,饰有“V”形鎏金纹饰与卷云纹。茎无箍、首,前部宽厚,后部细薄,中脊隆起,两侧有凹槽,断面近扁圆形,应便于接纳木柄。铸造精整,保存较好,周身布满浅绿色和红色锈斑,一侧刃部有劈裂痕迹。身长41.7、最宽处4.4,脊厚1.1,格长1.1、宽4.8,茎长10、宽1.1~2.1,通长52.8厘米。重795克(封三:1;图一:1)。身后部两侧有错金铭文2行8字,为:“我自铸少身之用铍。”(图一:2)铭文刚劲有力,工整秀美,具有春秋战国之际金文的书写特征。现将铭文释读如下。

“我”,这里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作器者的名字。西周早期有我方鼎<sup>[1]</sup>和叔我鼎<sup>[2]</sup>,因这里的“我”与两件西周铜器的作器者年代相距久远,故当非一人。二是铸造者的自称。《说

文·我部》说:“我,施身自谓也。”《诗·大雅·常武》:“整我六师。”朱熹集传:“我,宣王之自我也。”《诗·小雅·白华》:“俾我独兮。”朱熹集传:“我,申后自我也。”《文选·班固〈西都赋〉》:“作我上都。”张铣注:“我,天子也。”因此,这里的“我”当是铜铍铸造者的自我称谓。

“自铸”,“自”,自己。“铸”,铸造。

“少身”,应是作器者的谦称。《左传》昭公三十年:“敝邑之少卿也。”杜预注:“少,年少也。”《论语·季氏》:“少之时。”皇侃疏:“少,谓三十以前也。”《吕氏春秋·知士》记载齐宣王的话说“寡人少,殊不知此”。是“少”有年幼之义。《太玄·玄衡》说:“少,微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少其所不足。”王聘珍解诂:“少,犹薄也。”是“少”亦有微薄之义。“身”,身体。故“少身”本是指年幼、微薄的身体之义,这里当是作器者的谦称。

“铍”,此字左旁从金,右旁从皮,与云梦秦简“铍”字的构形相似<sup>[3]</sup>,当是铍字。金文“铍”仅见于五年邦司寇剑铭“冶尹蔑半铍拑剂”<sup>[4]</sup>。此字《殷周金文集成》释为“ ”<sup>[5]</sup>,《古文字类编》释为铍<sup>[6]</sup>,当以后者为是。《说文·金部》:“铍,剑如刀装者。从金,皮声。”因此,“铍”应是这件



图一  
我自铸铜铍及铭文摹本  
(1为1/4,2为1/2)

变 𠄎  
 止 自  
 𠄎 鑿  
 錫 𠄎

兵器的名称。

这件铜铍铭文的大意应为“我自己铸造防护微薄身体所用的铜铍”。铜铍的形制与春秋晚期攻敌(吴)王光剑<sup>[7]</sup>和战国早期戊(越)王州(朱)句剑<sup>[8]</sup>相似,铭文则与晋南出土的韩钟剑错金铭文<sup>[9]</sup>的书法特征相近。韩钟即晋国列卿韩穿,其活动的年代在公元前583~前565年,属春秋晚期<sup>[10]</sup>。因此,铜铍的年代当为春秋晚期,或迟不晚于战国早期。

## 二 铜铍的起源和形成年代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五年邦司寇剑中的“铍”字,应是“冶尹”的名字。而以往被称为

“铍”的兵器,如大攻尹铍<sup>[11]</sup>、郾王喜铍<sup>[12]</sup>、王立事铍<sup>[13]</sup>、阳安君铍<sup>[14]</sup>、春平侯铍<sup>[15]</sup>、建信君铍<sup>[16]</sup>、守相杜波铍<sup>[17]</sup>、信平君铍<sup>[18]</sup>以及秦俑坑出土的十七年寺工铍<sup>[19]</sup>等,都未自铭为“铍”。也就是说,以往所见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的器物,均未发现自铭为“铍”的兵器。因此,洛阳发现这件自铭为“铍”的剑形兵器弥足珍贵。

铍应是春秋中晚期产生的兵器。《左传》襄公十七年(前556年)载“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使贼杀其宰华吴,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杨伯峻注:“铍,形似刀,而两边有刃,宝剑属。”这应是有关铍的最早文献记录。《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吴公子光刺杀王僚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15年。可见“铍”可能早在春秋中期就已产生,到春秋晚期已在宋、吴诸国广泛使用。

铜铍的名称和形制,文献记载有不同的说法。1. 铍是剑的别名。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夹之以铍”疏引《说文》曰:“铍,剑也。”桂馥《说文义证·金部》说:“铍是剑之别名。”2. 铍是长刃的矛。铍,亦名为铍。《方言》卷九:“铍谓之铍。”郭璞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说文·金部》:“铍,长矛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非铍于句戟长铍也。”《集解》引如淳曰:“铍,长刃矛也。”铍,或名为铍。《说文·金部》:“铍,铍有铍也。”“铍”小徐本作铍,即剑鼻。颜师古《汉书·陈胜项籍传赞》注:“铍,铍也。”《玉篇·金部》说:“铍,长刃矛也。”这说明铍就是长刃的矛。3. 铍是剑形双刃小刀。颜师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长铍,长刃兵也,为刀而剑形,《史记》作长铍,铍亦刀耳。”刘逵《文选·左思〈吴都赋〉》注说:“铍,两刃小刀也。”这些记载说明铍与剑、矛、刀诸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如果仅凭文献记载,还是很难确切把握这种兵器的具体形制。值得注意的是,1979~1981年,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出土的

10余件类似短剑的铜兵器,有格、有茎而无首,柄后有木柄遗迹和铜镞。有学者将这种长兵器考定为铍<sup>[20]</sup>。因铍具有向前刺杀和横向劈砍的双重功能,兼有剑和矛的共同优点。这或许就是以往人们常把它称为“剑之别名”或“长刃矛”的原因。

洛阳新发现的这件铜铍,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且自铭为“铍”的兵器。它的形体较大,与当时的铜剑大体相若,应是早期铜铍的基本形态。以往发现被定为铜铍的兵器,如上述大攻尹铍、郾王喜铍、王立事铍、阳安君铍、春平侯铍以及秦俑坑出土的铜铍,多为战国中晚期器。它们均为剑形身、扁平行茎,与洛阳新发现的这件铜铍形制相同,尚保留着剑的基本形制,只是形体略微变小而已。而陕西旬阳出土的一件楚国有銎铜铍,刃面较宽,下有起回勾的三连弧刃,长42.4厘米<sup>[21]</sup>;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宜章铜铍<sup>[22]</sup>,身似剑形,后端有扁圆形銎,长36厘米<sup>[23]</sup>。这两件战国中晚期兵器,应是铍由剑向矛过渡后的形态。铍是由剑演变而来的脉络清晰可见,而认为“铍本身是以矛为母体吸收剑的形制发展而成的”推断<sup>[24]</sup>值得商榷。

### 三 结 语

以往所见春秋战国时期在兵器上错金勒名的,有“楚王盍章戈”、“越王者者於赐戈”、“宋公栾戈”、“宋公得戈”、“蔡侯产戈”以及楚“王孙渔戈”、吴“王子于戈”等器。这些能在兵器上“错金勒名的大者为王侯,小者为列卿”<sup>[25]</sup>,地位都颇为显赫。这件铜铍的铸造者自称“我”,说明他的身份当属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或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往发现的扁茎铜铍主要流行于赵、秦诸国,而銎式铜铍则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楚国。因此,这件铜铍当是春秋战国之际周王或中原诸侯列国某位国君铸造的兵器。

综上所述,这件铜铍的发现对研究铍的起源和形成年代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附记: 本文得到周建亚、李衡先生的热心帮助,蔡梦珂摄影,褚卫红绘图,一并致谢。

- [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 02763(以下简称《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
- [ 2 ] 《集成》01930。
- [ 3 ]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第91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 [ 4 ] 《集成》11686。
- [ 5 ] 《集成》第6408页。
- [ 6 ]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第1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 7 ] 《集成》11620。
- [ 8 ] 《集成》11624。
- [ 9 ] 《集成》11588。
- [ 10 ] 张颌《韩钟造剑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
- [ 11 ] 《集成》11576。
- [ 12 ] 《集成》11585。
- [ 13 ] 《集成》11674。
- [ 14 ] 《集成》11712。
- [ 15 ] 《集成》11707~ 11709、11713、11715。
- [ 16 ] 《集成》11695、11717。
- [ 17 ] 《集成》11701、11702。
- [ 18 ] 《集成》11711。
- [ 19 ] 刘占成《秦俑坑出土的铜铍》,《文物》1982年第3期。
- [ 20 ] 同[ 19 ]。
- [ 21 ] 《中国古代兵器》,第1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 [ 22 ] 原报告名为“铍”,《集成》11474名之为“矛”。
- [ 23 ]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 [ 24 ] 同[ 21 ],第132页。
- [ 25 ] 同[ 10 ]。

(责任编辑:李缙云)



1. 我自铸铜铍及铭文



2. 铜 矛